

《東華漢學》第 33 期；47-8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1 年 6 月

## 陸龜蒙——「士不成士」的隱居者難題探論

李奇鴻\*

### 【摘要】

唐代以建功立業為「士」的價值實踐，中唐以後許多人因一第難求而被迫隱居，遂面臨「士不成士」的難題。本文觀察陸龜蒙從「士人」轉為「隱居者」的過程，發現他即使隱居也仍保有部分的士人之志。陸龜蒙擔負著「無祿之士」的焦慮，自視以秩序之外的「江湖散人」；但也從對江湖散人的自我描述之中，肯認一種不涉事功的士人類型。從而，透過對地方事務的關注與批判，得以克服士不成士的難題。他所描寫的，已非純粹的精神歸屬，而是現實與閒適共存的田園生活，因而表現為不時有幽憤氣的詩人。本文除理清較為複雜的陸龜蒙隱居心態與文學，在看待晚唐士人帶有隱逸之思的作品時，亦或能有所助益。

**關鍵詞：**陸龜蒙，隱士，晚唐，士不成士，幽憤

---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 一、前言

中國隱逸思想伴隨著士文化的形成，<sup>1</sup>逐漸成為士人在困厄之際的思想資源，但終非主流，<sup>2</sup>經典亦言「士而懷居，不足為士矣」（《論語·憲問》），可說「隱居」對士人而言茲事體大。<sup>3</sup>隨著時代演進，隱居的動機也有所不同，在唐代，當科舉制度逐漸成為主要的掄才之法，<sup>4</sup>高門大族遂常需要透過科舉功名得以維繫，其影響甚巨甚至能左右存亡。<sup>5</sup>在資源爭奪的情形下，晚唐有許多士人欠缺一第便被迫隱居，<sup>6</sup>此際便面臨

<sup>1</sup> 關於士的起源與發展，以余英時之說為代表。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 1-108、205-327。

<sup>2</sup> 相對於士文化的討論，隱逸則多傾向描繪成士人逃離或抵抗既有價值體系後尋求自足的精神田園。可參考：日·根本誠，《專制社會における抵抗精神：中國的隱逸の研究》（東京：創元社，1952）；吳璧雍，〈人與社會——文人生命的二重奏：仕與隱〉，收錄於蔡英俊主編，《抒情的境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163-201；王仁祥，《先秦兩漢的隱逸》（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1995）。

<sup>3</sup> 關於隱居的定義，筆者採取較寬鬆的認定方式：「隱居」意近「懷居」，指居處一地，不從事以入仕為目的之相關活動。

<sup>4</sup> 例如《唐摭言》指出自文帝以後科舉制成為士人安身立命的重要途徑：「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唐·王定保撰，姜漢樞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卷三，頁 81。

<sup>5</sup> 諸如門閥世族中央化的現象，主要研究至少有：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唐宋之際社會轉變研究之一〉，《新亞學報》第四卷第 1 期（1959.8），頁 211-258；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美·譚凱著，胡耀飛、謝宇榮譯，《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sup>6</sup> 誠如吳在慶所云，晚唐時的隱居概況「也有不少人士在想出仕而不得的情況下走向隱居的」、「尚有一些士人本亦有用世之心，也曾奔波於登科求仕之途，然而終無所成，只好退而過著隱逸的生活」。吳在慶，〈談唐代隱士的隱逸動機與歸隱之路〉，《聽濤齋中古文史論稿》（合肥：黃山書社，2011），頁 65、70。

著「士不成士」的難題：他們雖自許為「士」，但礙於現實而無法入「仕」（取得官位），「兼濟」理想破滅，卻又不甘於「獨善」，處於一種不平衡的狀態。<sup>7</sup>更重要的是，從「兼濟」到「獨善」，意味著棄絕「入仕」之想，<sup>8</sup>而當士人轉為隱居者時，真能輕易改變根深蒂固的經世濟民之心？又或是如何自我解釋、自我認定新的身分？唐末著名隱士陸龜蒙（？-881？）便是一個極佳個案，藉由觀察他隱居時所認知的士身分以及面對「士不成士」的難題，將有助於一窺晚唐士人的思想世界。

陸龜蒙複雜的思想組成，乃基於詩文與筆記、史傳的儒者／隱士形象：他一方面熟稔於儒家經典、另一方面深諳於道教思想，加上隱居時屢屢有「幽憤」之言，以致他的隱居思想格外有個人色彩。<sup>9</sup>例如，元好問稱魯望隱居「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

<sup>7</sup> 中國士人熱衷仕途的心態，可參考：張仲謀，《兼濟與獨善：古代士大夫處世心理剖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隱居時如何獨善其身，對唐代士人而言仍未完全安頓。謝思煒認為，白居易的「獨善」是為了「在個人生活與政治生活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換言之，其「獨善」乃建立在得以任官的「兼濟」之上。相比以往，「無法入仕」對晚唐士人而言更加煎熬，誠如劉翔飛指出：「而晚唐之時，文士的這種心態〔不安於隱〕更要加上一重憂患背景。其時政治社會亂象叢生，文人厄於舉場的尤其較以往為多，……。這時他們所發出的亂世之音，感慨遂更深刻，關於仕隱的考慮也不再僅著眼於個人的得失，有心人更顯現出一種雖效老驥伏櫪而猶壯心未已的氣概。」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322；劉翔飛，〈論唐代的隱逸風氣〉，《書目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1979.3），頁 36。

<sup>8</sup> 田菱饒有興味地提到：「唐代文人很難全盤接受陶式隱逸代表的那種對仕途的永久棄絕及不太在乎自我謀生的困境。」可說唐代士人相當堅持「入仕」的終極理想。田菱，《閱讀陶淵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頁 99。

<sup>9</sup> 王立群指出，陸龜蒙文論「美刺懲勸」的思想核心也不時見於詩歌之中；這或許是「幽憤」氣的來源之一。無獨有偶，稍晚亦有不同學者從詩歌解讀中提出相似見解。王立群，〈陸龜蒙的文學思想——兼論陸龜蒙唱和詩與《笠澤叢書》成就差異的原因〉，《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2 期（1985.4），頁 45-50；韓雲波，〈陸龜蒙的隱逸心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棗莊師專學報》1995 年第 1 期（1995.2），頁 17-20；趙凌宇，〈關注現實，哀歌人生——晚唐詩人陸龜蒙的憤世文學思想初探〉，《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4 期（2006.7），頁 149-152。

掩」；<sup>10</sup>研究者如李定廣所云「雖隱而用世之心不滅」，或是劉寧所謂「不徹底」的隱居，<sup>11</sup>皆注意到出仕與隱居之間的張力與矛盾；王錫九認為，陸龜蒙是在無法改變社會現狀之下，憤而隱居，卻也由於隱居之後得以親近人民，遂有許多關心民生的詩文作品。<sup>12</sup>此說法固然有詮釋效力，若置於思想史的脈絡來看，實已涉及士人成為隱居者後其身分與價值轉變之命題，亦即，若考慮當時的價值觀，「隱居」乃與儒家理想決絕的選擇——但陸龜蒙仍嘗試在隱居中肯認自己身為士的正當性，其間的困難與自我圓成的過程也反映在作品之中。於是，我們不妨如此設想：陸龜蒙的幽憤之言、甚至躬耕壟畝，是否不只出於隱居者之口吻，也與那「不完整」的士人心態相關？據此，本文圍繞士人成為隱居者後其身分與價值轉變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 二、「士」身分的焦慮與回應：「江湖散人」的自我描述

陸龜蒙自稱出身名門「門等韋平，材兼魏邴」、「家為唐臣來，奕世唯稷高」，<sup>13</sup>少時躊躇滿志，通讀經史之書、熟習歌詩之藝，<sup>14</sup>也曾「嘗逞志於四方」，但苦於時命乖舛，最終選擇「進不參於多士，退宜追乎逸人」。<sup>15</sup>由此可知，陸龜蒙初以「士」為理想依托，但幾經受挫下，選擇歸隱。<sup>16</sup>「隱逸」對士人來說，不只是生活型態的轉變，更牽涉價

<sup>10</sup> 元·元好問，〈校笠澤叢書後記〉，《元好問全集》上冊（太原：山西出版社，1990），頁 769。

<sup>11</sup> 李定廣，《唐末五代亂世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48；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124。

<sup>12</sup> 王錫九，《皮陸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頁 203-209。

<sup>13</sup> 唐·陸龜蒙著，何錫光校注，《陸龜蒙全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頁 844、130。

<sup>14</sup> 見〈甫里先生傳〉，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939。

<sup>15</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846。

<sup>16</sup> 對於陸龜蒙隱居時間與是否曾出仕的考證，可參考：胡山林，〈陸龜蒙の

值的轉換。早先根本誠已點出此特質，神樂岡昌俊復以寒門出身的左思為例，指出左思儘管身懷文才壯志，因出身而被門閥所拒，其不得志之情在詩文中屢屢可見，當中不遇、不得志的挫折彰顯個人與時代的衝突。<sup>17</sup>同樣的，陸龜蒙既選擇隱居，便會面對諸多來自外在或內在，有關於「士」身分的質疑。

### （一）當「士」不入「仕」：無祿的焦慮

陸龜蒙對士身分的描述，有詠物以託志之作如〈書帶草〉，或是訓斥稚子時所言君子之道，<sup>18</sup>都可側面窺見自視為士的修養；而在〈田舍〉側重於「士不成士」的難題。〈田舍〉被收入《笠澤叢書》，從內容來看應在皮陸唱和之後、邁入隱居生活的作品，該篇以田野廬舍為題，開篇先描述田舍構造形製，頗有野趣，後話鋒一轉「宜從野逸，反若囚拘」，隨即將心中憤慨傾瀉而出：

天隨子愀然而吁，復自諫曰：祿以代耕，如無祿歟？無祿無耕，為工商歟？有沮溺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然，能無說焉？蓋仕不愧祿而揣政，咸率人以奉己。使農工之洎商，民棄其守而趨仕。農之仕，墮於力而希歲；工之仕，巧於文而幸貴；商之仕，射其肥而啖利。所以國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器，人闕有無之備，莫不由是。<sup>19</sup>

陸龜蒙意識到，「無祿之士」無法被劃分到「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之中，儘管，過去有長沮桀溺為農、輪扁製作木輪、弦高為商的流動之例，但「今則不然」。他認為，混漫四民分工乃違反秩序：倘若以農、工、

---

隱居について》，《中国文学論集》第25期（1996.12），頁35-53。

<sup>17</sup> 日・根本誠，《專制社會における抵抗精神：中國的隱逸の研究》，頁54-55；日・神樂岡昌俊，《隱逸の思想》（京都：ペリかん社，2000），頁35-39、41-48。

<sup>18</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913、959。

<sup>19</sup> 同前註，頁817。

商階層入仕，原本農階層便缺少勞動力、工階層善於紋飾（外表）而受寵幸、商階層則貪益好利；若是如此，國家則危殆矣。思及此，隱居者「無祿之士」的處境便顯得尷尬而充滿焦慮，故而再次嘯吁不已：

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遑之。將提新書，抱野史，上千天子之有司，如怒鼃之跳梁於風雨，自謂登乎龍籍，不其遠而遠而！……今則陽亢而驕，苗渴而萎。十穗百粒，獲夫涕洟。饘於是，粥於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為聖人，儉者茅茨，勞者胼胝。顧予懦夫，勤陋何疑。有鰥在下者，舉舜之德。毋惟汝諧者，授禹之辭。不舉不授，雖聖胡為？<sup>20</sup>

雖然思極奮起，欲將才能獻給天子，如同《韓非子》當中的「有氣之鼃」<sup>21</sup>，挾著豪氣萬千之勢，從此步入宮廷之中，然而，還談不及「登龍」，現實的天荒饑歲，就將這位貧士逼入絕境。聖人能夠「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但終究舜、禹都能自貧困的處境被舉授——天隨子的「不舉不授，雖聖胡為？」自嘆已經沒有如斯條件可供翻身。古今對比，過去「應然」之事，如今已無法再現，就此凸顯隱居的困頓與不甘。

〈田舍〉的困厄之情非是孤例，〈村夜二首〉其二後半也有相似的意旨：

平生守仁義，所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沈湎至酣籍。  
豈無致君術，堯舜馳上下。豈無活國方，頗牧齊教化。  
蛟龍任乾死，雲雨終不借。羿臂束如囚，徒勞誇善射。  
才能諛箕斗，辯可移嵩華。若與叵輩量，飢寒殆相亞。  
長吟倚清瑟，孤憤生遙夜。自古有遺賢，吾容偏稱謝。<sup>22</sup>

詩人自許堅守仁義、熟誦經典，卻始終無用武之地，「豈無……豈無……」的反詰語氣道出「不成士」的焦慮——隨著死亡與困境的譬喻，迸發為

<sup>20</sup> 同前註。

<sup>21</sup> 戰國·韓非子著，〈內儲說上〉，載清·王先慎集解，《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九，頁279。

<sup>22</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297。

「長吟倚清瑟，孤憤生遙夜」的唏噓。最末，詩人將自己比肩於歷代「遺賢」，自悲未來只得徒留衰謝。〈雜諷九首·其八〉亦如是，他自視「豈無中林士，貫穿學問骨。兵法五十家，浩蕩如溟渤」，如經重用便能止戰「北面師其謀，幾能止征伐」，遺憾的是現今不如古聖般能聽平民言「堯舜尚狗〔詢〕芻，公乎聽無忽」。<sup>23</sup>上述雷同的處境，在在告訴我們無法出仕、憤而隱居的艱困。

陸龜蒙面對現實的困難，並非僅是個人因素，其中未嘗沒有制度性的意識。「舉」與「授」都是帝王親授予職權的作法，然在唐代中後期，帝王親授並非最清顯的門路，進士才是。<sup>24</sup>取得進士身分尤為困難，必須經由禮部主試層層選拔，以致主試對新科進士猶如「再造之恩」，雙方形成特殊的「座主—門生」關係，座主以門生為傲、門生也常以「報恩」的心態回報座主的賞識，其也影響日後進入朝中的權力派系。<sup>25</sup>如此層層結構下的制度性意識，造就每年千餘人的應舉者煞費苦心的爭取不過二三十之數的桂枝。<sup>26</sup>誠然，「不舉不授」一方面是對自己不遇的

<sup>23</sup> 同前註，頁 282。原文「狗芻」，然對照下句，應改讀為詢，用的是《詩·大雅·板》「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之意。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載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一七，頁 549。

<sup>24</sup> 查檢《登科記考》，大中元年榜除了放進士二十三人，又「續放」三人，皇帝以「有司考試，祇在至公，如涉請私，自有朝典。從今已後，但依常例取舍，不得別有奏聞」為由，禁止入選正規放榜以外的人。可見即使是皇帝也很難、也不願插手科舉取士的運作，更遑論「舉授」之事。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頁 900。關於進士科漸受重視，可參考卓遵宏的研究。據統計，初盛唐進士出身任宰相的比例是 21.25%，任尚書省的比例是 18.63%；中晚唐進士出身任宰相的比例是 68.48%，任尚書省的比例是 60.20%。卓遵宏，《唐代進士與政治》（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頁 110。

<sup>25</sup> 相關討論可見：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第九章、十一章，頁 210-221、237-253。

<sup>26</sup> 例如《唐語林》「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冊府元龜·貢舉部》「〔大中十四年〕時舉子尤盛，進士過千人」。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六五一，頁 7802。宋·王謙，《唐語林》，《全宋筆記》第 3 編第 2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頁 68。

怨懟之感，但另一方面，是意識到若沒有受到入仕的肯定，「祿以代耕，如無祿歟？」的處境便指向「士不成士」該如何安頓的問題。

## （二）內尋「士」的精神品質

除了身分危機之外，隱居的另個影響是不得不以身體勞動換取所需。<sup>27</sup>〈甫里先生傳〉乃模仿〈五柳先生傳〉而來，兩篇有許多相似的元素。例如五柳先生「不慕榮利」，與甫里先生「貧而不言利」；或是五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與甫里先生「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五柳先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甫里先生「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有趣的是，儘管有諸多類似之處，陸龜蒙卻不嚮往陶淵明的傾向自然，反倒流露出較困厄之一面。具體而言，比起〈五柳先生傳〉強調「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的一面，〈甫里先生傳〉著重在忍飢守志的苦難：

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sup>28</sup>

「人既士矣」明確定位自己的身分認知：既然為士，便不得如商人般「言利」。這裡再次呼應了陸龜蒙將士視為四民秩序之一。同時，當無法履行對社會的義務時，至少也要持守孔子「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足與議也」與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個人道德規範。然而，面對貧窮的問題時，陸龜蒙亦利用聖人也曾躬耕的理由，回應外在雖身為士卻行農事的譏刺：

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

<sup>27</sup> 有論者便視陸龜蒙隱居中從事農務為其文化史上的意義。李翰、夏明帥，〈平戎策換種樹書——論陸龜蒙隱逸及其意義〉，《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2013.7），頁103-107。

<sup>28</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940。

舜黷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sup>29</sup>

不同於陶淵明〈勸農〉「傲然自足，抱樸含真」的情操，<sup>30</sup>陸龜蒙藉由「聖人一布衣」的對比，使得「由是苦饑」而躬耕看來沒這麼難堪。此外，還強調了「布衣」這個讓未入仕的稱呼，增強「從農」的合理性，也用「妻子之天」（夫）的倫理位置強化躬耕的正當性。在其他詩作中亦有「既被鄰里輕，亦為妻子陋」之句，<sup>31</sup>可見隱居生活並非僅有閒適快意的一面；而〈甫里先生傳〉的自我解釋，指向隱居生活乃時時受迫於「無祿」處境。引文最末，描繪了另一方苦境，名場上「蚤虱」追逐附於「名器」、「雀鼠」喫嚙於「倉庾」的情形；最後「如何哉？」的問句，將「隱居但無祿」與「在名場同流合污」的兩難反拋還給讀者——使讀者設身處地思考，似期待有識者能夠同情地理解他的處境。

「無祿之士」不被歸類在四民分工之中，然陸龜蒙反倒以此自嘲，有〈江湖散人傳〉、〈散人歌〉進一步窺見這種「秩序之外」的自我描寫：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sup>32</sup>

首先注意的是「散誕」並非負面用語，〈幽居賦〉想像隱居生活時使用「遇境逍遙，就魚鳥之性樂；開襟散誕，見羲皇之道尊」承續伏羲時代的遺風；<sup>33</sup>也有研究認為，陸龜蒙的道家思想與崇尚上古生活的傾向相通：「這是一個脫去世俗規範和人文價值的世界，與儒家強調禮樂教化的理想大異其趣」。<sup>34</sup>由此可說陸龜蒙的自視的「江湖散人」，乃從「束

<sup>29</sup> 同前註。

<sup>30</sup> 晉·陶淵明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38。

<sup>31</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65。

<sup>32</sup> 同前註，頁938。

<sup>33</sup> 同前註，頁847。

<sup>34</sup> 李長遠，〈皮日休、陸龜蒙與道家——晚唐儒家復興的一個側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9期（2018.5），頁88。

於禮樂者」的對立面審視自己。其次，「時之怪民」之所以被視為怪民，與「時」的因素有關。〈江湖散人傳〉強調散是變化的一種形式，是為了順應「時命大謬」（《莊子·繕性》）的時世：

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sup>35</sup>

此處的進退，或站在儒士的角度而言。退居若不散誕，則是為了「守名」，進仕若不散誕，便是為了持執時世之權柄；合而觀之，退居守名、進仕執權，皆以個人謀略、經世濟民為目的，此乃時之「束於禮樂者」。與此相對，陸龜蒙則以「時之怪民」、「散人」游於秩序之外，對立於儒家理想。在〈散人歌〉當中，江湖散人開場便頌「太古滄浪詞」，其詞代漁者聲口歌頌上古純樸風氣，頌畢感嘆「聖人事業轉銷耗，尚有漁者存熙熙」，其後乍似突兀地轉入「士」的發言：

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眾疎滄腐鱸鰕脫，止失檢馭無讒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sup>36</sup>

「風波」代指時世，意謂儘管時世不濟，仍不足以困限一「士」。何以？乃能夠「止失檢馭」那些生活器具的損壞失能。這並非指工匠的維修技能，而是能真知灼見地看透眼前虛妄，直指「真相」。例如，世間皆言「好男子」，但在他的眼中只是留著鬚眉的「婦女」；看似卑躬屈膝的乞丐，其實是偽為狂癡的正直之人。這裡藉由性別、尊卑的倒錯，凸顯「散」與「秩序」與表面相反的質地，亦暗指時人所見的「散人」，有與「士」相通的本質——進一步說，陸龜蒙所描述的「江湖散人」具備「士」的品德。可見，這裡的「士」，並非就制度層面而言，其內涵已有所改易。最明顯的證據是，散人歌的最末回到現實當中，所面對的並非世外山水，而是廣大蒼生：

<sup>35</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938。

<sup>36</sup> 同前註。

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撐頹隳。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sup>37</sup>

面對施政無方、民生凋蔽的狀況，江湖散人只得懷揣著古道，寄身鄉里田園之中。王錫九指出，「這樣的『江湖散人』，根本沒有放情山水、遠離社會；相反，他身在江湖，卻增強了其憤世的苦悶」；<sup>38</sup>所謂「憤世」蓋源於眼見荒政卻無能為力的憤慨，就本文而言，這正凸顯隱居者的身分難題：「江湖散人」的名號，與其說效仿古道，毋寧說是在「官家未議活蒼生」之時，表露出所肯認的一種士之品德。質言之，「江湖散人」這般離經叛道的自我形象，既是相應世俗價值的自嘲，也同時開顯另類的、能與隱居者互攝的一種內涵。

江湖散人之於陸龜蒙有相當意義，他於〈甫里先生傳〉也自述「江湖散人」之事，傳云：「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sup>39</sup>由此看來，陸龜蒙面對「士」身分的焦慮，乃藉「江湖散人」以舒緩。沿此思路，還得追問陸龜蒙所重視「士」的內涵為何？以下探尋陸龜蒙如何思考國家與人民。

### 三、從地方突圍：隱居者的批判視野

上節提到「江湖散人」為陸龜蒙最適的自我描述，為的是回應「士」身分的焦慮，亦可見陸龜蒙在隱居生活中重拾自我肯認。以下分別從陸龜蒙對先後發生的龐勛之亂與黃巢之亂的態度看起，藉由兩次的差異與所關懷的側重面，探討隱居者眼中的國家與人民。

<sup>37</sup> 同前註。

<sup>38</sup> 王錫九，《皮陸詩歌研究》，頁 208。

<sup>39</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941。

### （一）對動亂態度的轉變

龐勛之亂起於咸通九年，起初為平安南，募徐、泗之兵戍守桂州，原本三年一調，士兵竟連守六年，遂引起以龐勛為首的民亂。龐勛軍一路向北，盤據徐州一帶，另一方面，朝廷則集諸道之兵圍剿之，而龐勛面對大軍壓境，搜刮地方人力物資，謂「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sup>40</sup>陸龜蒙雖未被龐勛之亂波及，卻很關注此事：

尋聞天子詔，赫怒誅叛卒。宵旰憫烝黎，謨明問征伐。王師雖繼下，賊壘未即拔。此時淮海波，半是生人血。霜戈驅少壯，敗屋葉羸耄。踐蹋比塵埃，焚燒同稿秸。<sup>41</sup>

詩中呈現戰爭無情的殘酷與暴力，平定與作亂的過程皆是破壞，徒留殘破燒殘之景。陸龜蒙面對此，雖欲盡「士」之責，卻報效無門：

吾皇自神聖，執事皆間傑。射策亦何為，春卿遂聊輟。伊余將貢技，未有耻可刷。卻問漁樵津，重耕煙雨墾。諸侯急兵食，冗贖方翦截。不可抱詞章，巡門事干謁。歸來闔蓬楛，壁立空豎褐。煖手抱孤煙，披書向殘雪。幽憂和憤懣，忽愁自驚蹶。<sup>42</sup>

陸龜蒙面對叛亂後「諸侯急兵食，冗贖方翦截」的殘局，嘗試了科舉與入幕，最終無功而返。這份赤誠遂化為憤恨不平的「幽憂和憤懣」。隔年，陸龜蒙亦提及此事，此時已不復氣憤，反帶有自嘲的意味：

去歲王師東下急，輸兵粟盡民相泣。伊予不戰不耕人，敢怨烝黎無糝粒。<sup>43</sup>

「不戰不耕」乃相對於這起民亂的兩類人而言：「戰」者為逆亂方、平亂方的將兵，「耕」者為受調糧草的農民以及遭受波及的農民，也可引伸為烝黎百姓。陸龜蒙自稱「不戰不耕」，表面言事不關己，其實是沒

<sup>40</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二五一，頁8137。

<sup>41</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131。

<sup>42</sup> 同前註。

<sup>43</sup> 同前註，頁767。

有插手的餘地。另個例子也在亂後結束不久，詩中描述戰後一片狼藉的樣貌：

新春旒宸御輦軒，海內初傳渙汗恩。秦獄已收為厲氣，瘴江初返未招魂。英材盡作龍蛇蟄（時停貢舉），戰地多成虎豹村。除卻數般傷痛外，不知何事及王孫。<sup>44</sup>

在新春萬象更新之際，動亂戡定，遂大赦天下。<sup>45</sup>秦獄於涇陽縣附近長平坂，處長安周邊，原指幽拘致死的冤魂，代稱朝廷軍隊。<sup>46</sup>後句「瘴江」為嶺南廉州界江又名「合浦江」<sup>47</sup>，代指徐泗軍派往桂林之事。前四句描述靖亂後事，後四句則言志抒情。面對農村淪為戰場，卻只能袖手旁觀；之所以如此，乃「停貢舉」使得「龍蛇」無法騁力。就事實來看，儘管順利藉由貢舉入仕，也很難對平亂有所幫助；有意思的是，無論是事件發生時「射策亦何為，春卿遂聊輟」，或是發生之後「英材盡作龍蛇蟄，戰地多成虎豹村」，皆表現強烈的擔負感，而無法入仕成為最大的阻礙。如此思維貫徹了事件當下與結束後的自省，可說具有文官化制度意識，<sup>48</sup>亦意識到沒有取得「仕」的權力之前，很難有實際作為。

陸龜蒙面對龐勛之亂表現得悲憤交加，乃是空有抱負，卻無有相應的資格所導致。然而，他的悲與憤並非純自出於擔憂唐帝國的運勢，亦

<sup>44</sup> 同前註，頁 516。

<sup>45</sup> 《資治通鑑》：「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赦天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五二，頁 8153。

<sup>46</sup> 《長安志》：「長平坂在縣西南五十里，俗名睦城坂。東方朔記曰：漢武上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狀，……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眾庶，恨怨憤氣之所生也。是地必秦之故獄處也。』詔丞相公孫宏，按地圖果秦獄也。」宋·宋敏求，《長安志》，載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11集第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一七，〈涇陽〉，頁 6a-b。

<sup>47</sup> 《舊唐書》：「唐置廉州。大海，在西南一百六十里，有珠母海，郡人採珠之所，云合浦也。州界有瘴江，名合浦江也。」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四一，〈廉州下·合浦〉，頁 462。

<sup>48</sup> 關於文官化的說法，請參考：劉寧，〈唐末五代政局與士人「文官化」的消極發展〉，《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頁 266-298。

多關注眼前生民，在反戰態度上指責權貴「除卻數般傷痛外，不知何事及王孫」。如斯傾向在之後的另一場民亂「黃巢之亂」更加深化。

黃巢之亂起於山東一帶，同時有王仙芝於河南附近起兵，乾符五年（878）向南進發，沿著汴州、宋州，年末轉往福建、廣州。<sup>49</sup>黃巢之亂使得東南一帶遭到席捲，地方經濟也遭到破壞。陸龜蒙對此戰事的態度，可見於〈閒書〉：

病學高僧置一牀，披衣纔暇即焚香。閑階雨過苔花潤，小簟風來薤葉涼。南國羽書催部曲，時黃巢圍廣州告急，東山毛褐傲羲皇。升平聞道無時節，試問中林亦不妨。<sup>50</sup>

首聯承題目「閒」字而來，病中無所事事「學」僧一般焚香臥坐；「閑階」暗指少有訪客，「小簟」句描寫獨處的知覺感受。頸聯推開到外界狀況，以南國對東山，對比兩方的緊張與閒情，隱然有一股「不安」感：遠方戰事一觸即發，為何此地彷彿置身事外？尾聯進一步凸顯「閒」背後的不安感：「在升平之世或不必聽取諫言，但如今（危急之際）或許可聽取那些江湖之士的想法吧？」<sup>51</sup>相比於龐勛之亂的悲憤交加，陸龜蒙雖然也關心此事，卻顯得放低姿態、甚至可說消沉許多。在另首詩〈傷越〉也見類似態度：

越谿自古好風煙，盜束兵纏已半年。訪戴客愁隨水遠，浣紗人泣共埃捐。臨焦賴灑王師雨，欲墮重登刺史天。早晚山川盡如故，清吟閑上鄂君船。<sup>52</sup>

<sup>49</sup> 詳細過程請見：方積六，《黃巢起義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sup>50</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473。

<sup>51</sup> 郝天挺解此句曰：「未際昇平，河清難俟，以我處之，當作中林之士，亦何妨哉」，故云：「見出者不如處也」。這個解讀是將「不妨」解為「何妨」，且未解釋「試問」之意，似與原詩之意有所差異。元·郝天挺註，元·廖文炳解，《唐詩鼓吹箋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卷三，頁146。

<sup>52</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638。

首聯承傷越題旨，乃對黃巢軍席捲東南而發。「訪戴客」典出《世說新語》、「浣紗人」為西施，<sup>53</sup>皆出自越地；兩句借越人之口表達對戰事憂心忡忡。頸聯以雨喻鎮亂之師，澆熄兵火焦土，「刺史天」呼應「王師雨」，欲墮重登大抵指朝廷委任統領首長時態度反覆。兩句合指戰事緊急，然朝廷或因戰況難以掌握而舉棋不定。如此緊張狀況下，尾聯轉向詩人所在的楚地：「這裡山川依舊，沒有遭受戰爭摧殘，我也乘舟過著隱逸的生活」。可以說，〈閒書〉、〈傷越〉皆用「閒」來描述此地，而以緊張情勢描寫他方。如此並置值得進一步推敲，若考慮先前對龐勛之亂的態度，陸龜蒙內心「士」的抱負理應不會簡單地消卻，或不妨說此刻的「閒」亦有「只得閒」的沉悶——即在「未入仕」之前，面對國家危難是力不從心的。

最終，陸龜蒙面對國事等「大歷史」<sup>54</sup>的自我表述見於〈太湖叟〉：

細槳輕船買石歸，酒痕狼藉遍苔衣。攻車戰艦繁如織，不肯回頭問是非。<sup>55</sup>

首句「買石」呼應太湖，應為時人喜用太湖石經營庭園之故，如白居易有〈太湖石記〉、無可有「更買太湖千片石，疊成雲頂綠嵯峨」、黃滔有「石買太湖奇」之句，<sup>56</sup>皆是如此。次句自繪翁叟形樣，衣上酒痕班班狼藉，如苔癬蔓延一般，相似詩句如「酒痕衣上雜莓苔」<sup>57</sup>，頗有隱

<sup>53</sup> 劉宋·劉義慶，〈任誕〉，《世說新語》（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 474-475。

<sup>54</sup> 「大歷史」為筆者的方便說法，指國家的整體歷史，即史官撰寫的正史；相對於大歷史的是野史、稗官小說或鄉野閒談。陸龜蒙未明顯有對載入史冊的嚮往，也曾自述只要記載入野史即可，例如「自愛垂名野史中，寧論抱困荒城側。」唐·陸龜蒙，〈奉酬苦雨見寄〉，《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767。

<sup>55</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747。

<sup>56</sup> 無可，〈題崔駙馬林亭〉，載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八一四，頁 9248；黃滔，〈陳侍御新居〉，載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卷七〇四，頁 8176。

<sup>57</sup> 唐·陸龜蒙，〈和醉中寄一壺并一絕〉，《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682。

逸者的氣質。<sup>58</sup>三句則從太湖叟的眼光看待過往發生於此的戰爭，〈奉和襲美太湖詩二十首·練瀆〉亦有「戰艦百萬輩，浮宮三十餘」之句，<sup>59</sup>或同指吳越大戰於此之事。何錫光認為此「當指王仙芝、黃巢起事中在浙西的戰事」，或可聊備一說；<sup>60</sup>無論如何，應不致影響「太湖叟」的形象。末句由過往戰事反襯當下孤身遊於湖上的閒致，從而有末句「不肯回頭」的興衰之嘆。顯然，陸龜蒙並非就著董狐之筆，乃自「太湖叟」的眼光看待此事，進一步說，辯論吳、越的功過是非，太湖叟非是「不能」而是「不肯」，有著無用、不必等意味，即拋卻從歷史的角度看待「此身」與「此地」，隱然指向另一形式的身分認同。

讓我們利用幾句重新審視陸龜蒙對世亂的態度：「南國羽書催部曲，東山毛褐傲羲皇」、「早晚山川盡如故，清吟閑上鄂君船」、「攻車戰艦繁如織，不肯回頭問是非」；首先，陸龜蒙擺脫了面對龐勛之亂時的焦慮、無助，其次，仍具有關懷生民的肩負感，否則不會將外界動亂與內在閒境併比而觀，再次，三句不同程度地將「自身」與「地方」連結：「東山」典出謝安隱居會稽之山，「鄂君船」為楚地之船，「攻車戰艦」之處為太湖，三地皆在陸龜蒙所處的江蘇一帶。<sup>61</sup>綜合三點來看，陸龜蒙繞開傳統建功立業的抱負，轉而將對現實的關注移至「自身」及「地方」。

<sup>58</sup> 陸龜蒙不只自許為隱逸者，也寫其他隱逸者，例如〈丁隱君歌〉描寫丁翰之雖遭逢黃巢之亂，卻能事不關己得在小屋中生活：「去歲猖狂有黃寇，官軍解散無人鬪。滿城奔進翰之閒，祇把枯松塞圭竇。」面臨世亂，丁隱君與太湖叟有著相似形象。同前註，頁 982。

<sup>59</sup> 同前註，頁 229。

<sup>60</sup> 何錫光認為此句「當指王仙芝、黃巢起事中在浙西的戰事」，但僅以《資治通鑑》舉出王、黃剽掠浙西一事，未扣回詩中論述為何必為此事，顯得此說難以服人。筆者保守認為〈太湖叟〉與〈練瀆〉同在感懷過往同在太湖發生的功過是非。

<sup>61</sup> 陸龜蒙文學中多有親近地方的詩作，這在後來方志中也被大量挪用以為地方土俗。詳見：李奇鴻，〈納詩入志——范成大《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的新創與特色〉，《漢學研究》第三十七卷第 1 期（2019.3），頁 83-113。

## （二）隱居者的批判視野

原本，隱居者獨善其身乃為本色，甚至以拒斥入世為尚；<sup>62</sup>陸龜蒙的隱居視野特殊處在於又同時關懷地方、為地方發聲——其「江湖散人」的發言位置遂成為隱居者視野的批判。例如〈南涇〉之中轉述漁父的發言，闡述漁父以永續的概念說明人類捕魚之法，「大小參去留，候其孳養報」取其成熟者，保留待發育者，才能「終朝獲漁利，魚亦未常耗」。此自然法則亦運行於社會間，辜負恩澤如同違反仁義之道。接著轉入對社會的批判：

「……余觀為政者，此意諒難到。民皆死求菟，莫肯與愍悼。今年川澤旱，前歲山源潦。牒訴已盈庭，聞之類禽噪。譬如豢雞鶩，豈不容乳抱。孟子譏宋人，非其掘苗躁。」吾嘉漁父旨，雅叶賢哲操。倘遇採詩官，斯文誠敢告。<sup>63</sup>

將「漁者」比喻為政府、「魚群」比喻為百姓，指責政府搜刮民間，不肯苦民所苦。況且近年接連旱災、苦雨，早已民不聊生，訴狀（牒訴）早已盈滿高堂，應當給予適當恢復期，昔有孟子勸諫掘苗助長，如今正是政府應當體恤民情之時。末二句詩人自言，若有采詩官來此，必當將此言獻上。整體看來，「漁父」可能是虛構人物，借其聲口指責政府過責。最後的「作者現身」的發言立場，頗與國風采地方歌謠之旨類似，意在「下以風刺上」。陸龜蒙的發言位置並不是「采詩官」、亦不是民階層的「漁父」，而是獨立於官一民之外、帶有批判的隱居者。

陸龜蒙屢在詩作中展現對農民勞動者的憐憫，如〈蠶〉賦序言「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有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

<sup>62</sup> 盧桂珍分析六朝時期史傳敘事的兩種隱逸範式，分別為「自我強化」與「自我救贖」，都彰顯個人自我與社會間的抗衡，換言之，至少在六朝的隱逸敘事中，個人與社會無法共融。盧桂珍，〈史傳敘事裡的兩種隱逸範式——以范曄〈逸民列傳〉、沈約〈隱逸列傳〉為研究對象〉，《東華漢學》第24期（2016.12），頁61-106。

<sup>63</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307。

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陸龜蒙的〈蠶〉賦意在翻案，從另一個角度看待蠶的禍福，賦云：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遊熙熙。藝麻績纊，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官涎益饞，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sup>64</sup>

文中將「官」「民」對立，百姓為蠶本為衣著必須，但受到官府喜愛「十奪四五」而後變本加厲「官涎益饞，盡取後已」成為富貴之家的高級絲品。陸龜蒙痛批蠶業已成伐害人民的工具，尖銳指責應當「伐桑滅蠶，民不凍死」。對照荀子、楊泉〈蠶賦〉，荀子將蠶絲視為明禮制之服披「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sup>65</sup>，楊泉亦稱頌蠶絲「成天子之袞冕，著皇后之盛服」皆有鞏固王室威儀的功用；<sup>66</sup>此正是陸龜蒙批評之處：蠶絲取自民間，卻又用民間之物「貴賤以分」，更「既豢而烹」，豈非違於仁義之道？細想來說，陸龜蒙並非否定君王統治的合法性，而是在體恤民情之前提下進行，絕非利用上對下的權力關係加以剝削、予取予求。

若比較中唐對於勞動者與農事看法，陸龜蒙乃以隱居者的視野對為政者有所批評。白居易〈觀刈麥〉感其農事繁重，反觀自己以祿代耕，不禁心生慚愧：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

<sup>64</sup> 同前註，頁 809。

<sup>65</sup> 戰國·荀子，〈蠶賦〉，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一八，頁 477。

<sup>66</sup> 西晉·楊泉，〈蠶賦〉，載鄭競主編，《全漢賦》（臺北：之江出版社，1994），頁 350。

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sup>67</sup>

白居易透過婦姑、童穉、丁壯的總動員形容刈麥時的忙碌之景，炎炎夏日仍須戮力刈麥，婦人除照應幼子之外也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並不遜美男丁。然而農家還得面對賦斂「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白居易由此反思自己優渥處境「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不免慚愧。白居易觀看底層農民、描寫農事，可謂寫實體恤民情之作，乃以「地方官」的角度憐憫之，並對「歲晏有餘糧」感到慚愧。陸龜蒙的〈五歌〉序云：「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願歌其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五歌以自釋意」，言欲為勞者作歌。其三描寫刈獲，因寫農物欠收的慘況，自是比白居易更為悲切：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希疏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挂。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災，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困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籍，苟有區區宜拊拊。本作耕耘意若何，蟲豸兼教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饑尚責如齊糴。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恣徵索。平生幸遇華陽客，向日餐霞轉肥白。欲賣耕牛棄水田，移家且傍三茅宅。<sup>68</sup>

前四句描寫旱災欠收的慘狀，陸龜蒙身為莊園主人亦「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隔日清晨巡視田野，卻見「十穗蕭然九穗空」，幾乎無法果腹，何況還有官家田賦。「下民」同時面臨天災、人禍，可謂內外交迫。古時魯國飢荒，還有糴米之策，如今任由恣意徵索，民不聊生。結尾歸結自身，慶幸還能修仙學道，並考慮變賣家產、移居山中。

<sup>67</sup> 唐·白居易，《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一，頁22。

<sup>68</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978。

比較白居易與陸龜蒙，兩人都關心且憐憫勞者，但心態略有差異。面對農民的辛勞與苦痛，白居易因俸祿與付出的不對等感到慚愧，陸龜蒙則是將責任歸咎於地方的為政者。這裡並非要給予褒貶，而是看見制度意識已深影響士人／隱居者的思維方式，特別是隱居者面對生民苦痛，只能慶幸自己畢竟不是為農者，還有上山修仙學道的選項。這好比「太湖叟」聽聞遠方戰事，卻言「只得閒」的力不從心，其在心裡感受是相似的。

隱居者批判的立場是自外於「官—民」關係，且對立於與地方官或為政者，雜體詩〈水國〉亦為一例，此詩諷刺地方長官坐視民生凋弊：

水國不堪旱，斯民生甚微。直至葭蕩少，敢言魚蟹肥。我到荒村無食啗，對案又非梁謝覽。況是乾苗結子疎，歸時祇得藜羹糝。<sup>69</sup>

前四句描述所見，原是水鄉澤國、魚蟹肥美卻因旱災而消逝。五、六句言旱災造成荒村無糧，欲呈訴狀給長官，所遇卻非清廉的「謝覽」，<sup>70</sup>其間諷意昭然。相似的詩例還有〈彼農四言〉其二探討收成與賦歛的關係：

《禹貢》厥田，上下各異。善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南畝，旱氣赤地。遭其豐凶，概斂無二。退輸弗供，進訴弗視。號于旻天，以血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嫉悍吏。<sup>71</sup>

《尚書·禹貢》中土地肥美、貧瘠各有劃分，上位者應要隨著土地收成而改變賦稅，也要隨著豐凶年有所調整。如是豐年「野有遺穗」則要增

<sup>69</sup> 同前註，頁 760。

<sup>70</sup> 《梁書·謝覽傳》：「〔謝覽〕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關通。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綽、東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一五，〈謝覽傳〉，頁 72。

<sup>71</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764。

賦、若「旱氣赤地」便要裁量。如今卻「遭其豐凶，概斂無二。退輸弗供，進訴弗視」收成一概取其定數，在凶年等同率獸食人、王無罪歲了。結尾回到《詩》下以風刺上的傳統，欲以此言控訴地方痛楚。從上述諸例可知，對國家大事力不從心之餘，陸龜蒙將目光轉向地方，予以關懷生民、針砭為政者——此乃著眼地方的批判視野，也是隱居者士不成士難題的突圍。

一位隱居者卻對地方庶務的關懷與批判，其思想或與其自謂「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與以求聖人之志，莫尚乎《春秋》」<sup>72</sup>有關。可惜的是，目前學界還未對此有深刻的討論，<sup>73</sup>但從〈求志〉的自白「酌大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宜乎沮齊侯於夾谷，斬正卯於兩觀。溝公墓以掩廢逐，隳私城而防僭亂。用千載之遺法，發一辭而可判」來看，「用千載之遺法」應與春秋決獄的致用之法有關，而他所追求的「聖人」理想與孔子尊尚名分尊卑的理想相近。在現實中則利用文學來懲戒干擾四民秩序、治理不彰的地方官，例如以經典之言抨擊「悍吏」：「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嫉悍吏」；<sup>74</sup>此外，他亦自制《耒耜經》，似乎並非文字筆墨的遊戲之作。綜合來看，隱隱然有一條致用的思想脈絡於其中，然經學非筆者所長，此部分仍有待研究。

過去研究認為陸龜蒙隱居後卻屢屢展現的社會寫實一面，是不完全隱居、仍帶有入世之心的表現。透過上述爬梳，發現陸龜蒙儘管隱居，也從未斷絕與外在世俗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他的關注面向從國家大事轉向對地方庶務的批判。這種出自隱居者視野的批判，在隱逸文學傳統看來顯得「幽憤」不已。由此想見，陸龜蒙所自述的隱居生活，必然也

<sup>72</sup> 同前註，頁 939、820。

<sup>73</sup> 關於陸龜蒙與經學的關係，陳弱水已點出中晚唐文人治經的現象，惜未有足夠篇幅論及此現象帶來的思想或文學轉變。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422-423。

<sup>74</sup> 唐·陸龜蒙，〈彼農四言〉其二，《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764。

與過去傳統中間雲野鶴、超然獨立的精神不同。以下就隱居自述的詩作，加以整合為完整的隱居思想。

#### 四、對隱逸傳統的容受與轉變：世俗化的視角

對於中國的隱逸傳統，根本誠的研究是較早且具代表性的看法，該書曾歸納隱逸對時代的五個意義，分別是：（一）隱逸是否定的概念、（二）隱逸是主體性的概念、（三）隱逸是價值轉換的概念、（四）隱逸是自由的概念、（五）隱逸是第三世界的概念。<sup>75</sup>上述五點大抵呈現以「希企隱逸」、「為隱居而隱居」而適用於唐前。<sup>76</sup>唐代士人隱逸情形更加複雜，誠如陳貽焮與施逢雨藉由觀察李白隱逸求仙所呈現的時代風氣，<sup>77</sup>唐代不但盛行「終南捷徑」，<sup>78</sup>到中唐白居易身居官場嚮往隱逸境界而闡揚的「中隱」概念，<sup>79</sup>隱逸思想親近世俗之一面益發顯明。到了晚唐，隱居的動機還多了避亂保全的目的，例如司空圖在庚子之亂後

<sup>75</sup> 日·根本誠，《專制社會における抵抗精神：中國的隱逸の研究》，頁 48-59。

<sup>76</sup> 希企隱逸為王瑤著名的觀察，反應六朝的隱逸風氣。王瑤，〈論希企隱逸之風〉，《中古文學史論》（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頁 49-68。黃偉倫則認為六朝有「為隱居而隱居」的情形。黃偉倫，〈六朝隱逸文化的新轉向——一個「隱逸自覺論」的提出〉，《成大中文學報》第 19 期（2007.12），頁 1-26。

<sup>77</sup> 陳貽焮，〈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論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從政途徑〉，《唐詩論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 155-181；施逢雨，〈唐代道教徒隱士的崛起：論李白隱逸求仙活動的政治社會背景〉，《清華學報》第十六卷 1+2 期（1984.6），頁 27-48。

<sup>78</sup> 「終南捷徑」的概念可能早於唐代，明確提出是在《大唐新語》：「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迎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唐·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十，〈隱逸〉，頁 157-158。

<sup>79</sup> 關於中隱的討論相當多，茲舉詳細討論此概念的研究之一。賈晉華，〈「平常心是道」與「中隱」〉，《漢學研究》第十六卷第 2 期（1998.12），頁 317-349。

隱居王官谷。<sup>80</sup>可以說，隱居的動機與目的各不相同，而陸龜蒙值得注目之處在於，他藉由對隱居場所的不同描述，試圖融攝隱居者與士人兩種身分，這不僅反映對士身分的思考，亦對隱逸傳統有所容受與轉變。

陶淵明對隱逸傳統的影響力深遠，至晚唐文學亦有與其相關的意象：柳、菊、桃花源。<sup>81</sup>陸龜蒙有關隱居的詩作自然與陶淵明有密切關係，除了前述自傳，還有詠陶之作〈漉酒巾〉，也有相關作品，例如「酒痕衣上雜莓苔，猶憶紅螺一兩杯。正被遶籬荒菊笑，日斜還有白衣來」便見好酒、種菊的傳統隱士形象。<sup>82</sup>但上述意象並非陸龜蒙對隱逸傳統的突破，重要的是，他深化陶淵明在隱居生活中「田家」的現實要素。唐代詩人所想像陶淵明躬耕的日常生活，大抵如王績將農村想像為桃花源「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言昔避秦」或王維與李德裕汲取農村的閒逸「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老農爭席坐，稚子帶鋤經」。正如葛曉音與田菱指出，較早有躬耕經驗的詩人應屬儲光羲，但儘管儲光羲有短暫的隱居經驗、被認為詩風與陶相近，後人並不會因此視他為隱逸者、隱逸詩人。<sup>83</sup>

真正在詩中表現退隱、躬耕者，要到晚唐陸龜蒙，錢鍾書更稱「陸魯望自號『江湖散人』，甫里一集，莫非批抹風月，放浪山水，宜與淵明曠世相契」。<sup>84</sup>他不只有許多有關農事的詩文，更替漁、樵、茶、酒等生活周遭的器具賦詩，也著有關農具的《耒耜經》，可說在題材與內容上皆不同於傳統。更重要的是，比起隱逸傳統的閒逸情調，陸龜蒙的隱居作品亦多呈現處於兩難的境地，例如〈江墅言懷〉描述雖未被黃巢之亂波及，卻也自身難保：

<sup>80</sup> 李奇鴻，〈不安頓的隱士——唐末司空圖自保心態下的書寫策略〉，《政大中文學報》第34期（2020.12），頁45-82。

<sup>81</sup>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頁209-213。

<sup>82</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682。

<sup>83</sup>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頁258-259；田菱，《閱讀陶淵明》，頁68-69、234-237。

<sup>84</sup>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90。

病身兼稚子，田舍劣相容。跡共公卿絕，貧須稼穡供。  
 月方行到閩，霜始近來濃。樹少棲禽雜，村孤守犬重。  
 汀洲藏晚戍，籬落露寒春。野卉歛還整，家書拆又封。  
 杉篁宜夕照，窗戶憶〔倚〕疎鍾。南北唯聞戰，縱橫未勝農。  
 大春雖苦學，叔夜本多慵。直使貂裘敝，猶堪過一冬。<sup>85</sup>

前四句點出身處農村田舍的境況：生病又須養家，在沒有受到公卿貴人的資助下，只得藉由農作來活口；其他詩也提到相似的困苦，〈紀事〉開頭「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疎放。苦為飢寒累，未得恣閑暢」，後雖遇投契之主，卻最終未果。<sup>86</sup>如此看來，儘管有隱居心志，但現實壓力不斷席捲而來，不時壓迫著生計。但在這看似愁雲慘霧的隱居生活中，卻乍來閒適的田園風情——江墅週邊的杉木竹篁與夕陽相映成趣、詩人倚在窗戶旁喝著疎陋的酒；近聞遠方戰事不斷，反覺躬耕生活亦合宜心意。最末，自比有井丹能通五經的學識、卻如嵇康慵懶避世，惟今只希望能安穩度過接下來的嚴冬。

陸龜蒙藉〈江墅言懷〉所描述的隱居生活，是從原本困境（戰事）逃離到另種困境（飢寒）。更擴大來說，正如〈甫里先生傳〉隱居時面臨「由是苦饑，困倉無升斗蓄積」與政治上充斥「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的兩難，隱居為權衡下的選擇。在〈村夜〉中不免流露怨懟之情：

既不誤人知，空餘樂天命。如何在田野，家事苦遼夔。  
 耕稼一以微，困倉自然罄。<sup>87</sup>

「既」的口吻是已經對拋卻建功立業之心，選擇退守，但「如何」句又揭櫫另一面「家事」（生計）的困難。對於此，陸龜蒙也只能感嘆時命乖舛，如〈自和〉所言：

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著書糧易絕，多病藥難供。<sup>88</sup>

<sup>85</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292。

<sup>86</sup> 〈紀事〉回憶與鄭仁規同遊，但屢受讒言而不用之事。同前註，頁300。

<sup>87</sup> 同前註，頁296。

<sup>88</sup> 同前註，頁294。

此「時」應當是〈哀時命〉為屈原哀悼的「予生之不遘時」之「時世」，〈自和〉推究眼前諸般絕境乃「命」與「時」的衝突而來。雖然，經典有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但歸隱後卻要面對謀生的困境，從而「固窮」為對個人志節的考驗：「樂天命」自是據《易·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而來，自是絕棄入仕之後的思想支柱，卻要飽受「家事遼夔」之苦。至此，陸龜蒙可說毫不掩飾隱居之苦、質疑「樂」之可能，亦是挑戰自陶淵明樹立的隱逸傳統。事實上，陶淵明也面臨相同困難，在〈歸去來兮辭〉序透漏任彭澤令前時生活也是相當困苦：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緡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

儘管如此，陶淵明仍毅然棄官、回歸田園，以任其自然。<sup>89</sup>〈歸去來兮辭〉最末也提到了「時」與「命」的議題：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sup>90</sup>

若仔細辨別可發現兩人所理解的「時」是不同概念：淵明的「善萬物之得時」之「時」有自然規律的意思，「寓形宇內復幾時」之「時」為人生倏忽的線性時間；<sup>91</sup>魯望之「時」則是帶有政治秩序意味的俗世，例如江湖散人為「為時之怪民」、詩中「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都非自然規律的時間意義。兩人對時的認知不同，進而隱逸的理由也有所

<sup>89</sup> 關於陶淵明辭彭澤令的動機，回歸田園固然是為夙願，近因則是程氏妹之亡；但從陸龜蒙〈自譴詩〉「乘興先秋解印歸」來看，他認為陶淵明隱居主要在於任其心意。故此不考慮陶淵明奔喪棄官的因素。同前註，頁 649。

<sup>90</sup> 晉·陶淵明，《陶淵明集校箋》，頁 454。

<sup>91</sup> 楊玉成考察陶詩中的時間概念，其中「善萬物之得時」乃自然循環之時間，與其相對的是「寓形宇內復幾時」之線性時間。楊玉成，〈詩與時：陶詩與中古時間詞語〉，《東華漢學》第 11 期（2010.6），頁 52、100。

不同：陶淵明順其自然、任其心意，肯認「富貴非吾願」之後決意歸耕；陸龜蒙則是在時命乖舛的挫折下選擇隱居。因此，陶淵明能夠宣稱「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陸龜蒙將「樂天知命」負面解讀為「空餘樂天命」，不免認為隱居生活有虛耗、徒勞之感。從而兩人同樣面對隱居帶來的貧困，雖皆固窮守志，但顯現截然不同的情調。

陸龜蒙對「時」的概念既異於陶淵明，所居處的田園自不必是遺世而獨立的「桃花源」，僅是時世之中遠離官場文化的鄉野村落、也就是「甫里」。把握甫里的場所意義時，不妨以李白與廬山的關係為例，以見唐人的一種隱居心態。關於李白的隱逸觀，施逢雨認為，李白的「隱士意識」是傾慕於功成名就後再事歸隱的模式：

他自認超曠不群，是天生的隱士、神仙材。但他也認為自己應該顯達濟世，以盡自己事君榮親的世俗任務。因此，他希望能像范蠡、張良那樣，先成就一番功業，然後再去實踐肥遯飛昇的願望。<sup>92</sup>

蕭麗華剖析李白的廬山詩，認為「顯達濟世」的關鍵在李白遭逢安史之亂而於廬山隱居時，受永王之辟入府的抉擇：

那一刻李白想到的是人生功業的最高境界，廬山作此一決定，似乎政治時局的時機已到，李白尋求軍功的機會已經來臨。……當下他便在實踐著自我建構「安石出東山」的人格功業的崇高符碼，自認於此之後，人間世的功業應可臻於圓滿，而後可以效留侯、朱公遊仙湖海，是為積極的入世兼出世的意義。<sup>93</sup>

李白先後隱居廬山多次，除了修仙求道、習業山林之外，便屬永王事件最接近建功立業的理想。廬山之於李白，是遊仙修道的聖山、避難保全之地、亦是功成名就後「仕隱兩全」的終所，就後二者意義而言，廬山

<sup>92</sup> 施逢雨，〈唐代道教徒隱士的崛起：論李白隱逸求仙活動的政治社會背景〉，頁46。

<sup>93</sup> 蕭麗華，〈出山與入山：李白廬山詩的精神底蘊〉，《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10.12），頁214。

並非隔絕俗世之處，乃遠離政治文化之地。相對於李白於廬山面臨「安石出東山」的大好機會，陸龜蒙始終處於兩難：一方面政治時運不濟，正需能人志士，另一方面苦求溫飽以待更好時機。也就是說，甫里並非自適自足的精神田園，它與現實接壤，現實的生存問題、政治問題仍不斷襲來，正如隱居作品〈江墅言懷〉、〈戰秋辭〉仍述黃巢之事以及〈採藥〉時仍「諷〈盼牢愁〉」、「吟〈哀時命〉」。<sup>94</sup>看似逸於四民之外的「江湖散人」所作之歌〈散人歌〉在後半更有大段感嘆亂事：

或聞蕃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續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剪凶逆，須召勁勇持軍麾。四方賊壘猶佔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鋤笠，詬吏已責租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sup>95</sup>

「蕃將」指李克用趁黃巢亂時占據河北，僖宗年少只得依賴內朝平亂，但內部意見不一，導致叛軍日漸壯盛，黃巢軍甚至突破禁軍在潼關駐軍，進逼京師。<sup>96</sup>關於黃巢之亂可以有不同看法，陸龜蒙所關心的不只是「太宗基業」的問題，還有「四方」百姓遭受劫掠的慘狀，而自己「歸來」躬耕無法自免於外。可注意的是，雖然「甫里」是歸隱之處，也需繳納「租錢」、同樣受到戰亂波及。所以，即使陸龜蒙自視「江湖散人」能散於世間秩序之外，但隱居「甫里」仍需面對苛政、戰亂的現實處境。

至此，有一條脈絡逐漸顯明，即在唐人建功立業的價值觀下，隱居空間越來越有世俗化的一面。<sup>97</sup>從陸龜蒙的住所來看，它僅遠離政

<sup>94</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 292、944、900。

<sup>95</sup> 同前註，頁 970。

<sup>96</sup> 有關黃巢軍相繼攻克洛陽、長安的細節，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五四，頁 8235-8240。

<sup>97</sup> 除正文舉的陶淵明、李白之外，王維是力圖將隱居場所佈置如世外桃源的詩人之一。蕭馳，〈問津「桃源」與棲居「桃源」——盛唐隱逸詩人的空間詩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2 期（2013.3），頁 1-50。其後中晚唐講求在官場的空隙中尋求安逸。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州吏」〉，

治中心，而非將之視為逸於秩序之外，在〈自遣詩〉其十七表述了如是差異：

淵明不待公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我為餘糧春未去，到頭誰是復誰非。<sup>98</sup>

前二句引述〈歸去來辭〉的內容，自無須贅述，重點是詩人在三四句的自省。在陸龜蒙看來，兩人對「謀身」的態度有所不同，陶淵明還未等到秋收便辭官歸隱，而他為了生計，至春季應試時仍未離鄉——這沒有絕對的答案，但且顯示陶、陸隱逸的態度，陶淵明講求「乘興」而歸，以任心為要，陸龜蒙則在躬耕的糧食與入仕的俸祿兩方權衡下做出「未去」的決定。此「未去」充滿不確定性，不知「誰是復誰非」，也意味著隱居生活在現實考慮下必須接受考驗。之所以如此，乃是相比於陶淵明重構之後的「人境」，<sup>99</sup>陸龜蒙的隱居場所已不僅是精神的、也同時與現實頡頏，故詩人總在精神理想與現實挫折之間擺盪，從而我們在〈自遣詩〉除了見到詩人的自省、亦能見到如「一派谿隨箬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瀾未碧蒲猶短，不見鴛鴦正自由」<sup>100</sup>的閒逸情調。

當詩人的隱居場所不再與俗世相隔，接鄰的視野也不同于桃花源，而是農村與城市的差異時，總是關注世俗的「士」意識便不時閃爍其中。在〈登高文〉中，稚子在重陽日詢問父親是否登高望遠「趨山選台，席餌樽醪」以稍解鬱悶之情；陸龜蒙卻以為不可，他首先描述自己的處境：

吾數畝之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撫之，與善治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五十卷第1期(2013.1),頁88-103。

<sup>98</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649。

<sup>99</sup> 蔡瑜以陶淵明復返自然的過程，認為他透過與自然的互動，重構人倫關係的「人境」。此人境根基於人與地方的親密關係，在陶詩中處處可見和諧與平和氣氛。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陸龜蒙固然繼承此傳統，但也受制於「士不成士」的難題，顯得不那麼安頓、甚至有幽憤氣。

<sup>100</sup>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653。

疾乎聲顏。一驥在阪，百駑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況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忍欺。<sup>101</sup>

隱居的苦境前述已詳，這裡特別舉出如斯處境的同類，如「一驥在阪，百駑在閑」，他們「傳嘶振秣，侮病擠辱」，大聲呼救著等待糧草、受病所苦又相當虛弱。陸龜蒙自是水火之中的「駑馬」之一，但為何不可登高呢？陸龜蒙取《孟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之意，其登高之旨在體會「觀」的道理，以水為喻便是「必觀其瀾」，如君子「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然陸龜蒙所觀，為時世之混亂苦痛，如「假竊名器」與「佞舌啞啞」之政治昏昧、鋪張浪費的「庸兒賈夫」、「簡棄信行，附比凶德」的道德淪喪、「生靈幾何，過半減耗」與「鄉毆吏笞，不舍童毫」的民不聊生；如此種種不忍卒睹之景象，使得登高不僅無法稍解鬱悶，反而彌加痛苦。從所「觀」之物可知，此乃經世濟民之「士」心中所揣，非如長沮、桀溺般講求自保的隱居者所見，故有言「慘戚在下，吾寧忍欺」。接著，陸龜蒙從遠望時世的視角收轉回自身：

我中時病，言開怒隨。我感物悴，遐瞻邇噫。是使災眚彌熾，鬱陶愈悲。唯爾教我，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憤憤。

「我中時病」凸顯了「我感物悴」但畢竟是「百駑在閑」的諷刺，這種不平衡造就「言開怒隨」的憤激之情。不只如此，面臨天下危難之際，自己也深受其害「我穀未實，我蔬未肥」，不得不「弗視農圃」，否則「吾將曷歸」。在這裡，農圃是遠離政治的隱居場所，卻也接鄰天下，彼此同舟共濟。因此，〈登高文〉既描寫隱居、又具備兼濟天下之志，可說陸龜蒙不啻為以「無祿之士」的心態書寫隱居生活。

總結而言，陸龜蒙與傳統的不同處在於描寫了隱居所帶來的苦境。不只如此，由於隱居場所展現世俗的一面，隱居者也不能全然說是自由

<sup>101</sup> 同前註，頁 959。

的、獨立的、否定政治的人物。因而，陸龜蒙儘管在遠離官場、仕途的隱居生活，卻不時有其憤慨、幽憤之言。從陸龜蒙的例子來說，觀察晚唐文人的隱逸活動或詩歌語言，宜回到當時政治環境中考察，不能純以文學傳統或六朝隱士風範看待之。

## 五、結論

中晚唐士人追逐科舉制度的風氣，使得及第與否成為實踐建功立業的分水嶺，從而，蹭蹬仕途者或有深淺的在詩文中展現隱逸之思。過去研究認為，這是不充分的隱逸之想，亦不足論。但觀察陸龜蒙從「士人」轉為「隱居者」之間的價值與思想轉變，發現他即使隱居也仍保有部分的士人之志，而彼此間的衝突與調和，蓋有相應的思想資源與思考方式；本文認為，釐清此線索，或有助於認識晚唐的思想世界。

隱居之所以有「士」身分的焦慮，在於隱居者為無祿之士，既無法建功立業，遂被排除在社會四民分工之外。也由於無祿，在沒有家業作為後盾的情況下，亦面臨缺乏糧資的生存危機。因此，忍飢守志顯得格外嚴苛。然而，儘管面臨種種困境，陸龜蒙在「隱居但無祿」與「在名場同流合污」的兩難之間，仍堅持作出選擇並予以回應。具體來說，陸龜蒙面對他人的嘲弄，反倒自嘲以「時之怪民」的「江湖散人」抵禦之。研究者指出，「江湖散人」不如表面來得灑脫，實際上內心亦是「憤世的苦悶」之人。換個角度說，「江湖散人」看穿世間的不公義，以秩序之外的批判態度指責官府無能，亦可說無祿之人因被排除在四民之外，從而能以另種視野看待一切。這裡，「無祿」、「四民之外」反倒位於官一民以外，並藉由批判立場履行士的使命。

陸龜蒙對龐助之亂與黃巢之亂的態度，從最初的憤慨到自嘲置身事外的「閒境」，背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憤慨之心。由此可窺見他儘管隱居，也從未斷絕與外在世俗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此後關注面向從國

家大事轉向地方庶務，且多帶有批判的意味。細察陸龜蒙對地方的批判，主要針對酷吏、惡政造成人民的苦痛，也發現正由於隱居者處於四民之外的邊緣位置，才能別於中唐「地方官」的立場，而以官一民之外的位置批判為政者的不仁。這種源於隱居者的批判，在傳統隱逸文學中並不多見，或來自經學或儒家的思想資源。由此想見，陸龜蒙所自述的隱居生活，必然也與過去傳統中閒雲野鶴、超然獨立的精神不同。

陸龜蒙複雜的隱居思想，於隱逸傳統有所容受與轉變。陸龜蒙繼承陶淵明所開創的田家要素，描寫農事的辛勞，但相比於不時發生的戰亂，躬耕生活仍較為適宜。與陶淵明的不同之處在於，陸龜蒙將「自然之時」視為「政治之時」，從而隱居展現世俗之一面。具體而言，當隱居場所不再隔絕世俗，而僅是天下之一處，便不能免於政治之外。因而，陸龜蒙的隱逸思想仍不時有著入世精神，文學作品中也不總是閒適風光，不時帶有「幽憤」氣。

## 主要徵引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戰國】韓非子著，【清】王先慎集解，《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戰國】荀子，【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載【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 【晉】陶淵明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
- 【唐】王定保撰，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唐】陸龜蒙著，何錫光校注，《陸龜蒙全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 【唐】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王謙，《唐語林》，《全宋筆記》第3編第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宋】宋敏求，《長安志》，載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第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元】元好問，《元好問全集》上冊。太原：山西出版社，1990。
- 【元】郝天挺註，【元】廖文炳解，《唐詩鼓吹箋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 【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 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
- 鄭競主編，《全漢賦》。臺北：之江出版社，1994。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 【日】根本誠，《專制社會における抵抗精神：中國的隱逸の研究》。東京：創元社，1952。
- 【日】神樂岡昌俊，《隱逸の思想》。京都：ペリかん社，2000。
- 【美】譚凱著，胡耀飛、謝宇榮譯，《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方積六，《黃巢起義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 王仁祥，《先秦兩漢的隱逸》。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1995。
-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 王錫九，《皮陸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 田菱，《閱讀陶淵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
-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 吳在慶，《聽濤齋中古文史論稿》。合肥：黃山書社，2011。
-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
- 吳璧雍，〈人與社會——文人生命的二重奏：仕與隱〉，收錄於蔡英俊主編，《抒情的境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163-201。

- 李定廣，《唐末五代亂世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
- 卓遵宏，《唐代進士與政治》。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 張仲謀，《兼濟與獨善：古代士大夫處世心理剖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陳貽焮，《唐詩論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
- 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
- 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二）期刊論文

- 王立群，〈陸龜蒙的文學思想——兼論陸龜蒙唱和詩與《笠澤叢書》成就差異的原因〉，《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1985.4）。頁45-50。
- 李奇鴻，〈納詩入志——范成大《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的新創與特色〉，《漢學研究》第三十七卷第1期（2019.3）。頁83-113。
- 李奇鴻，〈不安頓的隱士——唐末司空圖自保心態下的書寫策略〉，《政大中文學報》第34期（2020.12）。頁45-82。
- 李長遠，〈皮日休、陸龜蒙與道家——晚唐儒家復興的一個側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9期（2018.5）。頁77-116。
- 李翰、夏明帥，〈平戎策換種樹書——論陸龜蒙隱逸及其意義〉，《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2013.7）。頁103-107。

- 施逢雨，〈唐代道教徒隱士的崛起：論李白隱逸求仙活動的政治社會背景〉，《清華學報》第十六卷1+2期（1984.6）。頁27-48。
- 胡山林，〈陸龜蒙の隱居について〉，《中国文学論集》第25期（1996.12）。頁35-53。
- 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唐宋之際社會轉變研究之一〉，《新亞學報》第四卷第1期（1959.8）。頁211-258。
- 黃偉倫，〈六朝隱逸文化的新轉向——一個「隱逸自覺論」的提出〉，《成大中文學報》第19期（2007.12）。頁1-26。
- 楊玉成，〈詩與時：陶詩與中古時間詞語〉，《東華漢學》第11期（2010.6）。頁29-121。
- 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州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五十卷第1期（2013.1）。頁88-103。
- 賈晉華，〈「平常心是道」與「中隱」〉，《漢學研究》第十六卷第2期（1998.12）。頁317-349。
- 趙凌宇，〈關注現實，哀歌人生——晚唐詩人陸龜蒙的憤世文學思想初探〉，《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2006.7）。頁149-152。
- 劉翔飛，〈論唐代的隱逸風氣〉，《書目季刊》第十二卷第4期（1979.3）。頁25-40。
- 盧桂珍，〈史傳敘事裡的兩種隱逸範式——以范曄〈逸民列傳〉、沈約〈隱逸列傳〉為研究對象〉，《東華漢學》第24期（2016.12）。頁61-106。
- 蕭馳，〈問津「桃源」與棲居「桃源」——盛唐隱逸詩人的空間詩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3）。頁1-50。
- 蕭麗華，〈出山與入山：李白廬山詩的精神底蘊〉，《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10.12）。頁185-223。
- 韓雲波，〈陸龜蒙的隱逸心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棗莊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1995.2）。頁17-20。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Ge, Xiaoyin. *A Study of Pastoral School of Poetry*, C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 Hu Shanlin. "On Lu Guimeng's Reclusi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25, 1996, pp. 35-53.
- Jia, Jin-hua. "'Ordinary Human Nature is Buddha-Nature' and 'The Middling Hermit'," *Chinese Studies*, 16.2, 1998, pp.317-349.
- Kaguraoka Masatoshi. *Reclusive Thoughts*, Kyoto: Perikansha, 2000.
- Lee, Chang-yuan. "Pi Ri-xiu, Lu Gui-meng and Taoism: An Aspect of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Late Tang," *Humanitas Taiwanica*, 89, 2018, pp. 77-116.
- Liu, Ning. *Poetry Changes during the Tur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Liu, Xiang-Fei. "On Reclusive Culture in Tang Dynasty," *Bibliography Quarterly*, 12.4, 1979, pp. 25-40.
- Nemoto, Makoto.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in the Despotist Society: A Study of Chinese Seclusion*, Tokyo: Shingensha, 1952.
- Wang, Xijiu. *A Study of Pi Lu's Poems*.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4.
- Xiao, Chi. "Visiting Peach-Blossom Spring or Living within Peach-Blossom Spring: The Poetics of Space of the High-Tang Recluse Poe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42, 2013, pp. 1-50.

---

**Lu Guimeng:  
On A Recluse's "Incomplete Role of Literati" Dilemma**

**Chi-Hung Lee\***

**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meritorious service was a core value of the literati. After middle Tang Dynasty, many literati were living in seclusion due to the pressures of passing the national exam and were thus confronted by the "incomplete role of literati".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Lu Guimeng transforms from an aspiring literati to a recluse while maintaining the goal of passing the national exam.

Lu Guimeng bore the anxiety of "man with no salary," and held that he was a man of outside the social order. The name he gave this situation was "Jianghu sanren". However, through explo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anderer of lakes and rivers," he created a literati that was not related to the country. In overcoming this dilemma, he focused on local affairs. Thus, the seclusive life he depicted was not merely a metaphysical abstraction but a temporal reality, depicted from time to time by those poet sharing a "hidden resentment".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Lu Guimeng's living in seclusion and his works, which may help to understand other recluse's works during late Tang China.

Keywords: Lu Guimeng, recluse, late Tang China, incomplete role of literati,  
Hidden resentment

---

\*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